



回忆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生活

□ 王建一

改革开放之前,百姓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缺乏。就拿我们镇江来说,秋冬的晚上,7点钟一过,大市口周边的大街上就基本上看不到行人了,本来就很少的商店也关门打烊了,除了昏黄的路灯照着有限的范围,马路两边基本是漆黑一片。

说到文化生活,首先是阅读。那些年,很多图书被贴上“封、资、修”的罪名打入冷宫,解放路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政治读物外,文艺类图书除了《艳阳天》《金光大道》《南方来信》(越南)《欧阳海之歌》等寥寥几种外便再无可读的书了。那时候,一到上海、北京出差的机会,我总会去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淘宝,偶尔能买到《鲁迅杂文选》。那时书价便宜,一本一百五六十页的《且介亭杂文》也就五毛钱左右。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1974年左右买齐了一套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现代汉语知识丛书,包括《现代汉语拼音知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修辞知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现代汉语写作知识》,对我几年后参加1978年高考,语文考到77分帮助很大。除了买书阅读,就是借借借到设在山门口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阅读。借书证分两种,一种是借文艺社科类的,可以借到“文革”前出版的文化类图书,特别是小说,但这种借书证我们领不到,只有羡慕的份。还有一种是借科学技术类的,这种证没有限制,当年我在和平路上一家机械厂里当钳工,就办了一张,借一些和厂里机械技术有关的技术书籍,包括机械制图(识图)、机械原理、液压技术、平面、立体几何等方面的书回家看,对自己提高技术作用很大。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何用一根没有刻度的直尺和一个圆规把一个直角三等分、和仅用一个圆规把一个圆周六等分的方法,这些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很实用,比如在“法兰盘”上打六个等距离的孔,画线时就用得上,又快又省事。

当年报纸杂志也非常少。我当时在车间里当钳工,车间里订了一份《新华日报》,一份《参考消息》。《新华日报》是省级大报,都是大块文章,我们工人不爱看;《参考消息》是新华社办的,大小和如今《京报》一样,每天四版,刊登的大多是国外各大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报道的国际上的消息,现在看来,就是各个通讯社的要闻信息摘编,工友们十分喜爱看,好像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里,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每天的《参考消息》不停地从工友之间传递阅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好多人传看下来仿佛像一张旧报纸一样。

和现在相比,看看看电影也有天壤之别。“文革”十年期间,全国各地上演的主要是“样板戏”,如果哪天来一台其他的节目,就要把大家快乐坏了。记得有一年,南京市杂技团来镇江新华剧院上演一场杂技节目。我爸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但我也十分想看,于是想到一个办法,让爸爸和我都能看到十分难得看到的杂技节目。就是爸爸在看上半场的演出中场休息的时间,到剧院门口来,让我进场看下半场,我们对杂技的渴望感动了剧场工作人员,同意了我们的这个办法,实现了“一张票二人看”的愿望。

那些年的电影,记忆中主要是《青松岭》《春苗》《红雨》《侦察兵》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国产电影和有限的几部国外电影,如苏联的《列宁在1918》、朝鲜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等。这些电影上座率极高,几乎场场满座。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当年的人民电影院夜场电影散场后,狭长的中山路上挤满了回家的观众,大家一边走,一边兴奋议论着电影的情节,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那时除了人民电影院和大华电影院外,还有如省军区礼堂、河滨会堂、丹徒人武部的露天篮球场上也经常放映电影,只是不卖票,供“内部人员和家属”观影。

那些年镇江还没有电视台,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电视机,只有镇江有线广播站的小广播盒子,用广播线通向千家万户,一般院子里住几户人家的,就装在屋檐下,拉绳开关一拉,大家都能听到新闻、天气预报和“样板戏”及“红歌”,给老百姓单调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文化色彩。

上世纪60年代末,半导体收音机已经开始流行。记得我爸爸托我姨夫在南方买了一台“珠江”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就是我们家当年最值钱的家当。有了它,我们家热闹了许多,每天早晨6:30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晚上6:30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是爸爸每天必听的节目,我和弟弟主要收听文艺节目,小小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怀念我的恩师李剑青

□ 方裕喜

1959年,我在镇江二中(现崇实女中)完成了六年的初、高中学业,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采编专业学习。196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从此,我开启了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努力拼搏,积极进取的征程。

回顾往事,我所以能成为我们家七姊妹中唯一的大学生,首先要感谢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给我带来了福音;感谢国家的培养、亲友的支持和帮助;还要感谢镇江二中老师们悉心教育、万般呵护,是他们给了我知识、教会我做人的干事。尤其要感谢我的恩师、班主任——李剑青老师。

记得1959年7月高中毕业时,面临填写升学志愿,当时我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但我只知道,那时候有新闻专业的学校,仅仅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到底填写哪一所好呢?总是举棋不定。

就在这为难时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首次在全国招生,招聘通知下发到镇江二中,我看到后好一阵惊喜,心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向往的吗?但由于情况不明,仍下不了决心。考虑再三,只有求助于班主任李剑青老师。我对他讲了我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同意我报考广院。他对我说:“一个想进入高等学府或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对什么感兴趣,甚至喜好什么不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只要

你想清楚了,就要大胆地去力争,直至达到目的。”他还说:“不管你将来干什么,在哪里干,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的,你就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聪明才智努力做好。”

李老师的一番话使我明白了其中的深意,从而激励我报考北广新闻系的勇气和信心。也正是李老师的一席话,开启了我的人生路。

李剑青老师,1923年12月生于浙江长兴,1951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在解放军上海第三汽车学校、解放军镇江军管学校、镇江市职工中学、上海私立南洋中学任教。1956年9月调入镇江二中任物理教师,成为这所百年老校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拓荒者之一。

1958年9月开学时,李老师担任我们高三甲班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在一年时间的相处中,李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教学风格、高效的工作态度、善良的品德为我们所称道和敬仰。在业务上,他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诲人不倦,为人师表。在班务工作中,他注重方式方法、思想工作细致入微、因人而异、针对性强。和学生谈话,平易近人、耳入人心。例如,为了抓劳动教育,在公益劳动或清洁工作中,他总是身体力行,带头干重活脏活。

“文革”前,李老师一直担任高中物理和班主任的工作。他备课精心,上课认真,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有较强的实验、设计和操作能力,并亲自动手安装实验器材。

“文革”期间,因种种原因调至校办工厂劳动,并参与研制生产电风扇、维修电机等工作,使当时工厂生产的电风扇产品在镇江市场享有一定声誉,同时也为工厂争得了经济效益,对学校工厂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当第一批电风扇生产出来时,我喜欢它的小巧玲珑,且价格低、质量优,便买了一台。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第一台电风扇,所以使用时格外小心细致,平时注重保养,故一直使用至今还保持完好。

上世纪70年代末,李老师重回调回课堂上课。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能做好本职工作。他除做班主任外,还经常超负荷上课。当时因高中师资紧缺,受校长洪达琪之托,他曾一度同时兼任高中物理、化学两门学科的毕业班教学任务,每周课时数达20余节,从不叫苦叫累,保质保量圆满完成任务。这种敬业精神,曾受到学校领导的赞赏,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佩和尊重。

李剑青老师为人谦逊、助人为乐、爱护学生。在教工同事中不管是谁有难处,只要向他求援,总是有求必应。他精通无线电技术,常有人求他维修电视机、收音机,他都热情接待,不计报酬,以至他的家成了修理间。凡学生有困难,他都尽力相助,深得大家的尊敬。

1957年,他担任高二乙班班主任时,班上有一位叫刘忠善的同学不幸得了胃癌,该生家住苏北农村,仅靠寡母一人维持

生计,无力就医。正值为难之时,李老师将这位同学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多次与江滨医院联系进行治疗,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支出部分医疗费,直至病情稳定后送其回家休养。

1983年11月,李老师光荣退休,之后他仍然关心学校的发展,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至2000年4月9日因患食道癌病逝。在追悼会上,学校领导说:“李剑青同志从教32年,其中在镇江27年,可以说他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二中,为二中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还说:“李剑青同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仍然坚信党的方针政策、顾全大局、听从安排、勇挑重担、敬业进取、乐于奉献。”

三个“坚”字,充分肯定了李老师的政治品格,也洗刷了特殊时期对他的不实之词。校领导最后强调:“李剑青同志以他78年的人生经历,表现了一个普通人民教师的优良品格和一个知名教育工作者的鲜明风范。”并勉励大家:“要学习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助人为乐,为人师表的优良品德;团结奋斗,迎难而上,再创辉煌!”

李剑青老师是我心中的好老师,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教导我认真学习、刻苦攻读,既做好事,更做好人,使我受益终生。我会永远怀念他!

冷遹的对联诗作和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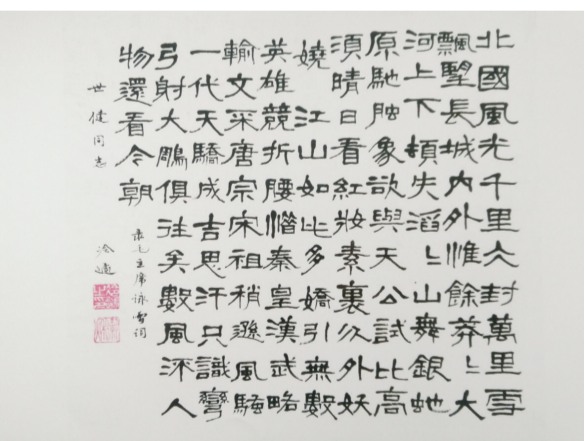
□ 王荣 王抒滢



在延安,冷遹(中)和毛泽东、黄炎培合影



中华职教社早期主要负责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冷遹)



冷遹手迹《沁园春·雪》

冷遹,字御秋,江苏丹徒人,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被授予中将军衔和文虎勋章;是中华职教社、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创办三益蚕种场、镇江女子职业学校、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是“镇江三老”之一;1945年赴延安访问,1949年参加人民政协和开国大典。除了这些,冷遹还有着“文人”“儒将”的一面。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3月14日,冷遹发唁电云:“中山先生手造民国,功炳简书。此次扶病北行,群视早占弗药,惊传薨逝,薄海同悲。敢布区区,上为国悼,下哭其私。”并书挽联哀悼:

三千年帝王本纪,一笔勾销,建中国新世元,五族共和,旋转乾坤赤手;
四百兆人民主权,万邦公认,弃天下如敝屣,九州多难,披肝胆胆为苍生。

冷遹的哀挽文字没有挽联套路常用的“哀语”,乍看用语平铺,雅俗共兼,实则将文化温润、政治结论完美融合,行文起伏跌宕,卓尔不凡。

冷遹极少作诗,也极少与别人唱和,有一首是他五十岁过淮阴客栈时作的诗:
初听流莺两三声,为爱残春戴雨行。
百岁光阴将过半,人生哪得几清明。

古人抗旱用“代田”

□ 赵染芹

入秋三个月来,几乎未落一次像样的雨,由是想古人面对旱灾的办法。

古代中国,旱灾频繁,且发生周期呈逐渐缩短趋势。有史料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1936年的2142年中,我国共发生旱灾1035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时任平江主簿的江西人王梦雷,目睹湖南大旱写下的《勘灾诗》“散吏驱驰踏早邱,沙尘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河畔泉源细水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此诗为今人留下当时旱灾老百姓凄惨的“真实影像”。更重要的是,由旱灾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旱灾引发的社会动荡,轻则流寇盗匪四起,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至大规模起义,危及王朝存亡。故而,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水旱灾害。正所谓“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旱、风、雹、霜、厉、虫)。

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古人研发并积累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诸如灾前预防、赈济救灾、移民搬迁、保护生态、兴修水利、改良品种等。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的抗旱经验所推广的“代田法”名垂青史。《汉书·食货志上》曰:“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意思说,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天下就会相当穷困,有勇力的人便聚众闹事,疲惫的男子衰弱的老人交换孩子而食。汉武帝晚年对征伐之事感到后悔,就封丞相为富民侯,下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并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晦三刚,岁代处,故名代田,古法也。”所谓“代田法”,即在面积为一亩的长条形土地上,开三条宽、深都为一尺的沟(畎),沟的位置每年轮换,因此称“代田”。播种方法为:“播种于刚中,苗生叶以上,稍薅垄草,因隳其土,以附苗根……每薅稍附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与风旱。”即将种子播种于沟中,等到苗发芽长叶后,在中耕除草的同时,将沟两边的垄土,耙下来理在作物的根部,这样便能起到防风抗倒伏和抗旱的作用。

《汉书·食货志》称“代田法”为“古法”,源于“后稷”。所谓“后稷”,不是指被尊为农神的周先祖弃,而是指以“后稷”命名的农书,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所引《后稷》农书为一回事。《吕氏春秋·任地》等篇所述的以畎亩制为中心的农业技术,畎亩制的种植法,《任地》曾以“上田弃亩,下田弃圳”来概括。“代田”就由畎亩法发展而来,基本结构也是垄和沟组成。

赵过总结推广这种农业新技术和新农具时,亲自指导在官塘地进行试验,取得了增产效果,还三辅地区组织新农法、新农器的培训,然后再从三辅地区逐步向河东、弘农和西北边郡等地推广,此“抗旱法”对汉武帝晚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代田法虽未能经久普遍施行,但它所包含的先进技术一直影响着后世农耕文明的进步,尤其与“代田法”相辅而行的耦犁、耧车等新农具推广运用,助推了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故而,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点赞:“赵过始为牛耕,实胜来耜之利。”

在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相当普及的今天,人们依旧没忘赵过推广“代田法”抗旱。

